

#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韩国人从军慰安妇问题：打破历史、政治的沉默

Bang-Soon L. Yoon,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 [摘要]

本研究有两个提问：第一，韩国为何对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受性暴力的慰安妇问题保持着沉默？；第二，1991年曝光之前，在韩国国内外局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慰安妇妇女运动是如何开始的？我对此有3点主张：第一，韩国由于独特的历史、政治以及社会因素，包括国家建设、政治文化、工业化以及被打压的政治体制等，对于慰安妇问题迫不得已地保持沉默。无论是要保护牺牲者权益的韩国政府机构，还是民间，都没有积极开展维护她们权益的活动；第二，韩国妇女运动本身没有由妇女主导，加上妇女的参政活动也远远不够，所以韩国慰安妇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第三，韩国民主化运动和妇女人权运动与国际人权体制挂钩之后，韩国慰安妇运动才得以进一步发展，打破了韩国社会对此问题沉默的局面。

关键词：慰安妇(Comfort Women)，韩国人从军慰安妇(Korean Comfort Women)，韩国妇女人权运动(Korean Women's Movement)，韩国妇女NGO(Korean Women NGOs)，妇女和韩国民主化(Women and Korea's Democratization)，全球女权主义(Global Feminism)，妇女人权(Women's Human Rights)

#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韩国军妓慰安妇问题：打破历史、政治的沉默

Bang-Soon L. Yoon,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 I. 概 要

1991年8月14日，以前被强迫作为慰安妇的韩国妇女金学顺（当时67岁，韩国女性，死亡于1997年）召开记者招待会，证言称，1941年在中国慰安所，在日本军的强压下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有了金学顺的证言，不仅南北韩、日本，还有菲律宾、泰国、中国、中国香港以及印尼等其他亚洲国家都开始关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日本军慰安妇问题（MCW或慰安妇）<sup>1</sup>。上世纪

---

<sup>1</sup> 本文中“MCW”或者“慰安妇”之类的用语与引用符号一起经常使用，是因为此类用语是如同历史性的一种代名词般一直沿用下来，社会中也是人们很熟悉的用语。但是，严格来说，此类用语是日本帝国主义使用的极端不公正，以男性主义为中心，具有性歧视的用语。而且，作者为了展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在军队中只能以性奴隶的身份活着的人们而使用此类用语。对此，请参照1996年夏天作者的资料（pp. 86-94），1997年研究的资料（pp. 220-222）。还有，以作者的资料为基准，此外，也使用了“韩国（从军）慰安妇”或者“KCW”此类用语，本文中为避免重复尽量不使用此类用语。

30年代至40年代，这些国家的妇女被迫当做日本军的性奴隶。仅在韩国就有234名的妇女受到性虐待。截至2010年1月，其中147名已死亡。从对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以下称，韩国慰安妇或KCW）的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出，韩国妇女金学顺的证言是半世纪以来被掩埋的二战慰安妇问题暴露的里程碑。

虽然曾经当过二战慰安妇的生活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但南北韩的老年层几乎知道在二战期间日本军强抓不少姑娘和妇女到慰安所的事实。在韩半岛分裂之前，韩国社会将她们称之为‘挺身队’，即自愿奴役队<sup>2</sup>。但在日本则用称之为慰安妇或从军慰安妇，最近出版物上常见的词汇是MCW或慰安妇。

UN正式文件或女性团体却常用“强奸中心(rape center)”，“强奸帐篷”(rape camps)里工作的“从军性奴隶(military sexual slaves 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更加常用。(Coomaraswamy, 1996; McDougall, 1998为;被当作日本军的性奴隶的韩国妇女委员会, 2000, 2005)。目前没有慰安妇人数统计的正确资料，但根据历史学者推算，大约有5万至20万以上。专家说，自1932年开始日本强抓韩国年轻女性当做性买卖<sup>3</sup>。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1910~1945），韩国妇女是主要的牺牲者。日本的老一辈们也许会很清楚的记得日军所属的慰安所有着怎样的规模，运营时间是怎样的，很清楚的了解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制度。实际上，1947年当时，日本社会通过书籍、军人日记和电影等大众媒体可以了解慰安妇有关情况<sup>4</sup>，到了70年代资料增多，到了80年代，其中一部分翻译成了韩文。1972年Bae,Bong-ki公开透露了在冲绳的“红瓦房”慰安所(Kawada, translated by Hahn, 1992)中的悲惨生活，KCW受害者中生存者的故事传到日本。在1982年金学顺发表正式证言之前，KCW另外一位受害者No,su-bok(当时住在泰国)早就通过泰国地方媒体公开了自己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和悲剧性的故事。1982年,No,su-bok奶奶公开自己曾经当作慰安妇，可谓是韩国慰安妇的首次证言。她的证言引起了人们对慰安妇的同情，激发了反日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但是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历史学者们，相关的研究者们，韩国政府，还有市民团体中的女性团体们因为对慰安妇问题调查的证据不足而未能展开任何活动。而且，1991年金学顺提出证言之前为止，大众对韩国和日本政府对KCW问题展开调查的要求不足，牺牲者们未能得到大众的支持。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

本研究由两个问题开头。第一，为何对KCW问题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第二，截至金学顺证言的1991年，韩国对内外有什么变化？如何诞生由少数女

---

<sup>2</sup> 一般来讲，在很多事例中，挺身队指的是日本殖民政府在战争期间中按牌防卫产业的人员。因此必须将慰安妇和挺身队分开理解。但是，有些事例中所说的挺身队可翻译为慰安妇。

<sup>3</sup> 当时大部分韩国慰安妇为17至20岁的年轻女性。难以正确判断“被动员”女性做什么样的性服务，其中有不到12岁的，甚至在供不应求的40年代，甚至40岁年龄段的妇女也被拉去了。虽然人数较少，但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以及新西兰等其他国家的妇女也被征入军队。根据中国最近的研究资料，中国慰安妇数量足以达20万名。

<sup>4</sup> Tamura Taijiro (1947)的*hunpuden*『卖淫故事』随后，被制作为电影 Ueno & Yamamoto (2004, pp. ix-x) 参考

性 NGO组织主导的慰安妇权益运动？韩国启动的慰安妇妇女运动主要有：寻找慰安妇受害者；实施口头调查并记录研究；要求日本政府和受害者本国做调查和赔偿；呼吁国际人权机构（UN或ILO等）的协助；根据国际法实施法制调查活动，与全球女性团体开展合作；为受害者提供福利项目等。对此的争议重点有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由于韩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社会情况（比如说，国家建设，政治文化，快速的产业化，还有压制的政治体系）而不得不对KCW问题保持沉默。对受害者们的人权和福祉应该予以拥护的韩国正式的政治机关和市民社会对此问题没有表现出任何关心。第二，韩国妇女运动从根本上不仅没有捍卫女性权益，也缺乏政治活动，因此KCW问题没有成为焦点。第三，韩国民主化运动和世界妇女运动与国际人权体制挂钩，随之韩国从军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同时开始开展慰安妇运动。我们进入本文之前，简单探讨一下不得不对KCW问题保持沉默的原因，比起战争的残酷性或者对女性的性虐待行为，是否有其他特别的现象呢？

### 从相对观点看慰安妇问题

研究慰安妇问题必须思考四个主题，但这由于从相对性的、历史性的角度接近的研究方式，按照情况结果会不同。四个主题是战时残忍行为、性、性暴力及种族问题。这都是政治、社会方面重要的问题，但在大众论坛却很少提及。尤其对战时残忍行为、女性受害者和性暴力连一次也没提过。揭露战时残酷行为并非易事。一般大众从现代历史书中难以看到战时残酷行为，战争结束后学术界没有形成研究该问题的氛围。数年来，二次大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Nazi's Holocaust)被否认，日本也依然强烈否认中国南京大屠杀事件<sup>5</sup>。到上世纪70年代，大屠杀研究微乎其微。但得益于对大屠杀研究的历史意义和被发现的资料，有关研究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Baumel 1998; Stern 1993; Rosenbaum 1996; Novick 1999)。从另一个角度接近战时残酷行为。到80年代初期，在大屠杀研究中对犹太女性受害情况研究屈指可数，原因在于对性残酷行为不受关注、资料也不充分(Baumel, 1998, p. 50)。加上，当时对于“要记住大屠杀的活动”包括研究、博物馆和纪念馆等，存在某种反感，连大屠杀中保命的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对残酷的性虐待行为研究分析。

要强调纳粹所犯的暴行不属于对女性的虐待，而属于对种族犯罪行为(Ofer & Weitzman 1998, Introduction)。从历史、文化和信仰的角度看，战时或一般社会保持沉默的行为掩盖了强奸、卖淫和性虐待行为等性暴力的事实。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继续蔓延。这种暴力不仅给侵犯个人隐私，也让人感到羞耻。因此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文化让受害者将性暴力行为视为应当掩盖的事情。而且当前将性暴力事件大题小作已成惯例。何况战时呢？处于战时或军事对峙局面的国家将强奸事件视为强国对弱小国的控制手段之一，甚至视为一种战争中倒霉而已。记者、历史学者、政府等社会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关注战时性暴力受害者，甚至没有认识到有关问题的严重性。到70年代初，

---

<sup>5</sup> Iris Chang的畅销书， *The Rape of Nanking* [南京大屠杀](1997)在日本却不受欢迎。

孟加拉国独立而发生的战争中，巴基斯坦士兵强奸20万名孟加拉国妇女。这事件公布于众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向世界传达该性暴力事件，确保受害者权益保障方面，西方女性主义者和地区的女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孟加拉国政府也以实现国家独立、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和援助为目的扮演了重要角色(Brownmiller 1975, pp. 78-87; Copelon, 1995, p. 197)。

在发生军事冲突时出现的性暴力有时会得到关注，但将它升格为女性人权蹂躏事件并非易事。比如，只有少数人知道，南斯拉夫市民战争中发生的性蹂躏事件，即种族清扫或“集团性暴力”(Copelon, 1995年)。到了90年代初期，当时2万至5万名女性受到强奸的大规模性暴力事件被英国女性从军记者所递过的资料公布于世界。卢旺达、苏丹、南非共和国等非洲国家也在军事冲突或市民社会冲突时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性暴力事件。根据“以文化、统计为标准”衡量的频度和残忍性，可以知道这种性暴力事件平时也经常发生的事实。

社会对战争的残酷性、性蹂躏及性暴力保持沉默，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中KCW得不到关注的原因也许没有特别的理由，或许它不是无法预测的问题。然而，在对战争的残酷性、历史以来的性蹂躏问题以及战时性暴力进行比较学的研究时，KCW问题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为何目前打破对此沉默？在找出其原因时，必须考虑韩国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过去韩国到底为什么要掩盖慰安妇事实？日本和其他受害国依然保持沉默的现在，韩国却为何要打破沉默？还有，这一问题与世界妇女主义者有什么关系？国际社会逐渐对人权问题予以关注，这对韩国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彻底研究。

## II. 历史背景：脱离殖民统治，冷战遗留的政治体系，无法主张自国权益

二战后，韩国动荡不安，从政治共同体的层次难以探讨日本战犯行为。1945年，韩国解放后，不久的1948年按照相反地政治理念成立了两个政府。南部和北部分别成立了韩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此进入冷战时代。韩国由于韩国战争(1950-1953)和二战的影响，经济和社会陷入不稳定局面，政治动荡日益深化。从40年代到50年代韩国致力于政治、经济稳定，将捍卫国家安全当作刻不容缓的国家根本政策<sup>6</sup>。因此从政治、社会角度来看，这些曾经像奴隶般生活过的KCW妇女和被殖民统治的韩国受害者<sup>7</sup>很难得以关注。

1940年代到1950年之间，由于共产主义者叛乱和政治理念对立，韩国国

---

<sup>6</sup> 关于根本性的政策“一连串优先的政策或者方向，即为大众政策的准备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价值，意识形态与经济，是社会体系形成的最基本要素，请参照Dolbeare的资料(1997)。

<sup>7</sup>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大概有七百五十万(推测人数)的韩国人因为日本战争而被征用，大部分男性被征用为劳役或者军人，被强制发配至日本，中国，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岛屿地区或者其他地区，其中推测有100万名以上劳役死亡。韩国政府至1994年为止对殖民地时期强制征用或者革出军队的问题也未开始做任何调查。学术界在1992年日本举办的针对韩国人强制征用的研讨会中韩国与日本一起参与的事件是最初的研究开始。参照1994年12月22日与1992年2月28日韩国日报。

内政治相当不稳定。所以完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急于建立反共国家是当时最首要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撤退，带有反共和保守理念的地方精英阶层替代了现有的行政管理和社会领导。其中多数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韩国人，随后也在政治、经济、教育、国家安全以及所谓“女性界<sup>8</sup>”的妇女共同体等领域等社会方方面面扮演领导角色(Kim, Lee 和 Chung等, 1993)。在如此权力框架下，国会几乎不能对于殖民统治时代的“亲日”势力反韩行为展开调查，尤其战后掌控的警察对此持有强硬的反对态度(Kim, Lee和Chung等, 1993, p. 25)。在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执政时，韩国政府和日本就殖民统治配赔偿进行2~3次谈判，持有强硬反日态度的李承晚总统要求日本36年的殖民统治赔偿每一年算一亿美元的共36亿美元等等大多数带有感情色彩的要求没有取得有意义的结果，两国谈判最终失败而终(Pai, 1991, p. 143)。但假设李总统和日本就赔偿问题达成共识，但该结果与如今浮出水面的 KCW受害者毫无关系。

加上，外部公共机构也没有呼吁社会保护受害者权益。1945年至1948年韩半岛南部处于美国的统治之下。不少资料证明美国早在1942年就知道慰安妇问题(Pang, 1992)。根据1944年美军资料，美军以“日本军内卖淫行为(Japanese Army Brothel)”为名，详细记录“韩国慰安妇少女”问题，包括动员过程、她们的生活、劳役情况、与日本军关系等<sup>9</sup>。1945年春天美军陆登冲绳（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大多数KCW），发现了日本军和年轻的“东方”女性的裸体照片。她们是被抛弃在离Naha市附近的当时日本作战总部(Shuri Castle)的“慰安妇妇女们”<sup>10</sup>。

国际人权体制也没有任何帮助。极东国际军事裁判所(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对于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战犯行为审议时,没有提过慰安妇问题。没有同盟的韩国连参与其审议过程也不被允许，对于日本对韩国的暴行审判也没有进行(Park, 1994)<sup>11</sup>。通过这样的审判难以实现申张日本军国主义受害者权益的正义。西方国家在战后权力分配上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亚洲国家几乎没有被确保权力(Hosoya et al., 1986, p.7)。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对于东京战犯行为进行审议时，对韩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的慰安妇受害者问题没有进行审议。但1948年巴达维亚（雅加达）法庭裁决，日本向在印尼的新西兰慰安妇提供赔偿。不仅如此，与新西兰慰安妇有关的日本军被处罚，甚至一部分日本军人被处以死刑(Hicks, 1994, pp.168-169)。但

---

<sup>8</sup> 这里“女性界”指的是，为保障妇女权益工作的妇女团体或组织。尤其在地方政治领域“女性界”的政治作用相当突出。一些妇女作为“女性界”领导人参与国会或内阁活动。

<sup>9</sup> 1992年7月关于韩国慰安妇问题的各部门工作及1994年驻印度、缅甸美军旗下战争情报和战斗心里工作组美国办公室的APO 689报告书（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Team Attached to U.S. Army Forces India-Burma Theater, APO 689 report）参考。

<sup>10</sup> 1992年玛婁(Manoa)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前教授舒耕德(Schubert)从1945年4月初到12月中旬担任冲绳活动的Army HQ第10位领导。1992年3月，笔者到夏威夷火奴鲁鲁进行采访时，他做了如此陈述。

<sup>11</sup> 一些研究资料包括在对于东京战犯行为进行审判时的对MCW调查内容,但没有能够了解全面内容的资料。

是美国审问部门将韩国慰安妇判定为卖淫妇或属于日本军的从军普通老百姓<sup>12</sup>。加上，冷战体制下，美国改变政策方向，消除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制裁，转而将它当作实现东亚权力均衡的重建对象国。因此驻日美军允许日本维持没有政治权力的皇帝体系，并以法律支撑日本皇室不负承担战犯行为的责任。在实际统治韩国时期，美军政府比对战争结果进行审判，更注重维持冷战战略，这是可想而知的。

战后时期，韩国性买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主要内容：一是，如1947年制定的“公娼”制度一样，废除卖淫行为的合法性；二是，将以卖淫为目的性蹂躏少女和妇女规定为犯罪。到50年代，在民间领域出现性买卖新形式，即，“红灯街”，一卖淫妇集聚特定地区的“红灯街”和基地村一起美军部队附近，服务于美军，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然而，对于这种新型性买卖行为韩国政府却没有实施政策制裁。因为当时社会环境不允许对这样的女性或性，所谓“脏”或“令人羞耻”的性买卖，性暴力进行争论。而且，历史学者、有关学界人士认为全然属于“个人隐私”的性剥削行为不成研究课题。韩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关于东亚和二战所写的历史书中几乎没有慰安妇内容，其原因或许是不知事实，或许是别有用意。战后，韩半岛不仅处于两个意识形态并存的特殊政治情况，也面临着国家重建的任务。因此，迄今为止，看待韩国历史的重点向围绕爱国运动的左右理念冲突或独立运动倾斜。与此相比，对殖民统治时代的受害者则等闲视之。换言之，只有关注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精英群体或领导阶层的资料，却忽视了其中的普通老百姓问题。在韩国出版的历史书，甚至与韩国妇女有关的历史书也没谈到 KCW问题(Kim Yung-Chung, 1976; Chung et al., 1986)。韩国历史学界对慰安妇的研究几乎为零(Kang, 1997, pp. 3-4)。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在90年代以前，没有研究 KCW问题。现实主义气氛笼罩国际关系学界，专家们致力于对军、国家安全等的“硬性”政治悬案研究，自然而然妇女人权、战时性暴力等的“软性”问题不属于重要的法律问题，最终被拒之门外。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的热潮日益加剧，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研究性政治学，逐渐关注由全球妇女主义者构成的NGO行动主义。总之，由于韩国特殊情况人们没有认识到 KCW问题的重要性，而对此保持沉默。因此，没有出现积极的团体活动，也无法实现有关制度保障。

### **持续沉默：KCW问题不纳入韩日间殖民统治赔偿条约中** **持续的沉默： KCW问题没有纳入关于韩日间殖民统治赔偿条约中**

韩国的60年代到70年代(1961-1979)以朴正熙为首的韩国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夺取政权.并-建立起了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其统

---

<sup>12</sup> 参考1994年驻印度-缅甸美军旗下战争情报及战斗心理小组美国办公室的APO 689报告书 (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Team Attached to U.S. Army Forces India-Burma Theater, APO 689 report)

治具有鲜明的反民主倾向,束缚着利益团体活动。朴正熙总统以共生位名义只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捍卫国家安全。执政初期(1962年)他出台经济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创造了“经济奇迹”。韩国成功实现产业化,能够让人们摆脱饥饿、贫困,并在朝鲜的挑衅下保障国民安全。同时,以此证明了以政变掌权的合法性。当时,令人关注的事件就是,朴正熙政府经过4年的协商,终于1965年签署韩日间基本条约(外交正常化条约)。该条约的背后隐藏着日本对朴正熙政权的产业化计划提供资金支撑。本条约中“请求权”条款(第二项1条“私有财产权和请求权”)是关于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赔偿。因此经过数年的协商才签署了该条约。之所以围绕这条款争论不休<sup>13</sup>,是因为这不仅事关赔偿金额,也是因为两国对殖民统治的利益和损失有着不同的认知。韩国主张的“请求权”与其说是对各位受害者的补偿,不如说是与债权、所有权、汇款、土地所有权、拖欠及前置性储蓄等的财产权利,没有提到慰安妇问题。即使将慰安妇问题包括在内,也没什么差异。“请求权”效力范围局限于以书面形式证明的,不包括受害者的赔偿金。因此韩日所定的“请求权”的标准与其说是法律依据,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的考虑(Pai, 1991, p. 141)<sup>14</sup>。朴正熙总统与日本进行首脑会谈的主要目的,可以说是引进日本的技术和资金实现工业化目标<sup>15</sup>。韩国政府的“请求权”赔偿金,到1972年仅对于被强制征用的已经死亡的人发放了每人三十万韩元的赔偿金。这其中不包括 KCW受害者。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不提 KCW问题。当时,韩国社会掀起了强烈反对热潮。反对该条约的报道连篇累牍,学生们、民间团体以及反日团体冲到街上示威。其示威团体中虽然有女子大学或女性组织,但 KCW问题依然没有受到关注。这样,到60年代,有关资料不仅没有把KCW定为殖民统治的受害者,反而低估为如同送到战场的“军事物品”(Sekiguchi, 1990)。除了hwang,Keum-ju奶奶以外,依然生存的 KCW 受害者中谁都没提到赔偿金问题。황금주曾经向时任第一夫人陸英修询问过自己是否也被纳入到1966年征用军领取的赔偿金对象中。但是,她随即就沉默了<sup>16</sup>。韩国政府对KCW受害者没有提供请求权的任何保障。因此KCW受害者掩盖着羞耻的经历,在饥饿和贫困中苦苦挣扎,在为了捍卫她们权利的民间团体帮助下,苟延残喘的活着。谁也不愿意代表她们立场,甚至KCW被误解为原来不存在的。因而KCW问题在条约中、“请求权”范畴里全然被拒之门外。

### 无法形成共识：“性”产业化和政治经济化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韩国出现以卖淫商业化的旅游形式,比如为日本男

---

<sup>13</sup> 对于赔偿金规模拖而不决。日方想要支付赔偿金五千万-七千万美元,但韩国朴正熙则要求日方起码支付五亿美元。

<sup>14</sup> 韩国总统卢武铉主张,这是一种政治协议,因此受害者和个人依然有权采取法律应对措施。参考东北亚委员会(2006, p. 91-93)及韩国国务总理室(2006)资料

<sup>15</sup> 商务共同体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他们认为韩国拥有无限的商机(Pai, 1991, p. 206)。

<sup>16</sup> 1994年9月4日,笔者采访的内容。要仔细了解,参考Yoon (2001-a, Ch. 12, pp. 1701-171)

性服务的“性旅游”，也称妓生观光，与此为一体的观光酒店也推出了<sup>17</sup>。因此韩国教会女性联合会(KCWU, 1988年)等地方教会和女性团体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但是由于只重视产业化的集权政府的压力，韩国女性界的反对运动无法形成共识而被打压。朴正熙政权以雄心勃勃的产业规划为基础，纷纷出台了戒严令、紧急措施及国家安全法，逐渐脱离民主主义，并迫使国民放弃市民权、市民自由等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行政策时，没有倾听国民的意见，几乎不让市民社会和利益团体参与政治活动，包括有关劳动权利、人权、市民权和市民自由等活动。有时，巧妙利用“国家安全”法或“反共”法控制政治反对势力和打压市民权利或自由。到1972年韩国政府推行维新（国家重建）体制，加大向政治势力施压力度。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名义，出台多项政策并建设社会基础设施，支持和发展卖淫事业(SBS, 2006; KWDI, 1998, pp. 41-45)。在初期阶段，政府政策重点在于，为美军提供号称以顾客友好型服务（如，在美军基地附近构建为美军提供便利的健身设施，允许美军基地附近的卖淫活动并负责性病防治监督管理工作）和让驻韩美军替代冲绳基地R&R在韩国度假。这种针对美军卖淫服务成为创汇主要手段。由于尼克松主义美军要从韩国撤回，韩国政府认为必定要实施这种政策。韩美联合委员会首届委员Kim,ki-jo透露，1957年至1958年，韩国年均贸易总量为一千万美元，其中相当于总量的一半，约500万美元来自于美军基地卖淫服务等娱乐产业。仅在1964年，针对美军卖淫服务创汇973万美元，为总量的10%(SBS, 2006)。因此韩国政府以“爱国”为名，对性服务人群进行政治社会化培训(SBS, 2006)。上世纪70年代，服务于参与“性观光”的日本男性的卖淫妇也接受过此类教育。对访问韩国的日本游客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从1971年到1973年，韩国入境游客中的日本游客比重分别为，41%，73.5%和80%。从中能够发现惊人的事实，就是其中70%为“妓生宴会”而来的(Li,hyeon-suk, 1992, pp. 82-83)。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女性知识阶层和代表韩国教会的女性领导人着手进行实际调查。她们最终得出结论，即，性观光也是无异于挺身队（慰安妇）的蹂躏女性的暴力行为。她们主张，日本留下的KCW惨剧和新的“商业模式”-卖淫都是服务于日本男性。她们还一针见血地说，“为妓生观光而来韩国的日本游客，不是在殖民统治时代蹂躏挺身队女性的军国主义者的后代吗？”(Li,hyeon-suk, 1992, p.84)。围绕这一问题韩国女性团体与日本女性界一度采取联合行动。韩国教会女性界开展的反对妓生观光运动，引起了教育界的反响。随后，到70年代初，此问题成为政治议题。但是国家权力试图遏制妓生观光的议题化(이현숙, 1992, pp. 92-93)。政府方面主张，将性观光要放在与女性人权问题的同一线上，这无疑是在企图阻碍经济发展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激进主义思路。

1972年，韩国总统朴正熙宣布戒严令，同时，如派遣韩国士

---

<sup>17</sup> “妓生”是韩国传统社会专门接受艺术、音乐教育的女性，有时提供性服务的人，类似于日本艺妓。以现代意义可解释为服务于上流阶层的卖淫妇。在2005年中期之前，标记为“kisaeng”，以后变标记为“gisaeng”。

兵创汇一样，采取通过培育旅游业创汇的政策。韩国首次吸引了大批日本游客，1973年旅游收入竟达2.7亿美元。相形之下，1968年参加越南战争的收入仅为1.5万美元(Hicks, 1994, p.174)。

妇女界的反对性观光活动被视为反政府行为，列为制裁对象。朴正熙政府认为，这种行为使韩日关系陷入僵局，或使为产业化的维新计划会以失败而告终，对此深感忧虑。当时，对韩国来说，日本是向韩国提供技术、微加工或半加工的产业资源以及资本的主要当事国。按照1974年总统紧急措施第4号,当时妇女主义者、妇女界领头Li,wu-jeong(教授兼前任国会议员)被抓捕，妇女界受到打击。以此为契机，维新体制加大施压力度，使性观光问题无法形成共识。在韩国社会充满的以男性为主的情绪作祟，多数韩国人认为“妓生观光”绝不是蹂躏女性的暴力行为。举个例子，上世纪70年代，政要、企业家、著名人士等领导阶层为了实现政治、交易或人际关系为目的，经常在料亭（有妓生的高级酒店）交流。将这种政治形势也称为“料亭政治”。1973年韩国首届教育部部长Min,gwang-sik在日本演讲中，发表如下内容。当时韩国识字阶层可能很受启发。

韩国女性为国家重建和创造外汇而不惜牺牲自己，尤其不分昼夜服务于日本男性的多数性服务群是真正的爱国者(Li,hyeon-suk, 1992, p. 89)。

首尔市旅游部门向从事旅游业的妇女提供一些制度保障，包括开设教育项目、以检查身体防范性病、发行身份证和资格证。教育项目中也有强调妓生重要性的内容，即为国家经济发展而服务于外国人的妓生不是卖淫妇，而是爱国者。值得注意的是，讲演者不仅是社会领导层和大学教授，其内容也与对殖民统治时代的挺身队（洗脑教育）和服务于美军的卖淫妇的教育内容一脉相传(Li,hyeon-suk, 1992, p. 89)。上世纪50年代，针对美军的军队卖淫是韩国主要的创汇来源。但与服务于一般男性的卖淫妇相比，对从事军队卖淫的人待遇更不好。政府没有保护她们的人权，却非常欢迎她们贡献于经济发展。韩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70年代，这种情况依然继续。地方政治体制注重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以维权政治系统迫使市民社会走向以男性为主社会之路。因而KCW问题和性观光问题被忽略不计。上世界50年代至60年代，韩国女性也对卖淫和性暴力漠不关心，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性观光才成为人们所认为社会丑恶现象，与KCW问题衔接引起社会关注。但是KCW问题面对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威权政治系统，迫不得已地继续沉默下去。

### 民主化和妇女运动

妇女运动的路线也是KCW问题不受关注的原因之一。20世纪初期，妇女运动的核心目标是祖国独立。战后，妇女界的行动主义局限于反共意识的范畴，只顾进行反共教育等枝节问题。因而妇女组织也与反共主义联盟一样，

只不过是為政治目标而存在的。韩国妇女界组织在亲政府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培养下成长起来，得到政府的资金援助。上世纪60年代妇女界行动主义不仅具有保守色彩，也因在政府支持下运作而得跟随政府的“指导原则”。这样，妇女界对妇女社会地位或权利和社政治的意识几乎为零，沦为政治势力的替罪羊。妇女界的组织基础如此不牢固，财政也严重不足，因此连领导选任也深受政府的影响。鉴于妇女界情况、以男性为主的政治文化，妇女界积极提高政治权力并提出妇女权益问题等社会问题是并非易事(Li,hyo-jae, 1989)。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把女性视作一种东西或者是政府目的动员的手段的传统观念依然继续，对1980年代的韩国性歧视政治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政府视妇女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让她们参与以现代化发展为目的的新农村运动、反共产主义联盟或竞选期间宣传活动等。然而，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由一些女性界人士为主出项提出带有进步色彩议题的“激进”潮流。但，一些带有“激进”色彩的女性界的潮流最终跟着追求广泛社会目标的势力发展。当时性问题是与爱国主义问题无法相提并论的课题。不管保守还是激进，韩国妇女忽视了KCW和人权问题的紧密关系。

解决慰安妇问题，要了解妇女人权，也要了解国家权力和性暴力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这些进程没有落实，初期阶段的韩国妇女运动得不到进展(Yoon. 2007年, 2001b)。而且，一般人们将对妇女的性暴力问题视作个人的问题。此时此刻，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女性意识和社会的认识，乃至对KCW问题的处理带来影响。一个是于1986年发生的Gwon,in-suk性刑讯事件，一个是，于1988年在韩国由KCWU以“妇女和旅游产业”为主题举办的研讨会。Gwon,in-suk是在工程工作，参加劳动运动的大学生，以涉嫌“反政府”活动被受调查中，被警察实施性暴力。为了辩护她，组织由166名构成的空前规模人权辩护团，各位妇女主义者也助一臂之力。最终她被释放，警察被拘留。本事件有几点启示。

根据有关资料，上世纪70年代后期，警察在审讯嫌疑人时，肆无忌惮地对其进行性刑讯，包括强迫接吻、身体接触、强迫脱衣服、强奸等。对于Gwon,in-suk的辩护和释放无疑是对政府权力的公开挑衅。这事件媒体传播起来，成为得到公众共鸣的新政治课题，从妇女运动角度，女性团体就保护妇女人权凝聚了力量，同时，使以性为工具控制人权的权力机制暴露无遗，激起大众的愤怒，乃至让国民广泛认识到国家和性之间的关系。随后，女性界积极展开性问题有关的活动，国民意识大大提高，使臭名远扬的KCW和其他妇女问题浮出水面。另外事件是，以女性和旅游产业“为主题的研讨会。这也贡献于卖淫和KCW问题受到人们关注。慰安妇生存者通过该研讨会获得一定的政治成果。在该研讨会上，人们主张国家权力和性观光业有关联度，把性观光产业问题视作韩国社会痼疾，也称为“新(neo)挺身队”。

妓生观光不是妇女个人道德问题，而是不得不依靠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韩国经济结构问题所导致的弊端。为了维护国家尊严，保护从事与此的人民的权益，必须撤掉国家支持发展的妓生观光。政府为创汇而发展旅游业，但结果，让不

少妇女走上卖淫之路。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韩国妇女必须对被日本军强征为挺身队受到欺辱的历史痛定思痛，并拒绝无异于“新(neo)挺身队”的妓生观光(韩国教会女性联合会 [The Korean Church Women United], 1988, p.100)。

如果没有妇女界的领导能力和妇女 NGO组织的努力，Gwon,in-suk事件以及以女性和旅游产业为主题的研讨会就会成为掀起一阵风的事件。还有，一些韩国女性能够积极参与慰安妇运动，这些都离不开上世纪80年代社会形成的民主化情绪。

在就KCW问题形成共识方面，韩国历史学者、其他社会既得利益阶层保持沉默，与此相反，一些妇女主义学着和女性NGO组织为打破沉默扮演了重要角色。教授、妇女界领导及活动家等开始收集有关资料，大众也纷纷参与其中并大力支持受害者。这种妇女的参与最终产出无比的成果。其实，Yun,jeong-ok教授以饱满热情积极开展了KCW有关活动，并支持有关人士收集资料。在年轻的时候，她亲自目睹了挺身队征用情况。早在1980年代她就开始收集有关KCW资料，多次访问有慰安所的日本之岛和冲绳等地。随后，她在1988年“性和旅游”研讨会上发表与KCWU委员一道撰写的报告书，成为KCW调查工作的起点。本研究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深入研究过军内部强奸事件。

代表妇女界的少数市民和为将性暴力问题纳入法律范畴贡献的NGO组织率先开展解决Gwon,in-suk事件和反对性观光的示威活动。并且，虽然体系还不完善，但于1988年5月正式设立KCW问题调查专门机构。按照KCWU、韩国女性连个会和女子大学生联合会等不少地方女性团体要求，时任总统卢泰愚在访日之前在大众面前把KCW问题定论化。不久，1988年7月，KCWU组织内部下设“挺身队”研究部门。接着，1990年7月，设立了“关于被日本军强征为性奴隶的韩国女性研究团体”（本文中以下简称“韩国研究团体”）的独立组织，1990年11月正式启动负责韩国国内女性团体的“为被日本强征为性奴隶的女性的韩国委员会（简称韩国委员会）”。以后，韩国国内外研究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有关活动团体也增加了。其中韩国委员会在对历史文件、各种活动(activism)、历史资料研究、国际交流、法律活动及受害者福利的信息进行处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韩国女性NGO组织活动处于萌芽阶段的1991年，Kim,hak-sun做Kim,hak-sun了证言。

### 全球妇女主义和世界人权体制

在KCW问题的宣传方面，与世界著名的女妇女主义者、NGO组织的联盟，尤其西方女性人权团体和UN体系的宣传方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女性团体始终与日本或其他亚洲受害国女性NGO紧密合作。其活动的一环，为了征求慰安妇受害者、战争参战士兵及一般人们的意见和证言，开设了韩

国和日本间热钱。此外，与日本女性团体继续合作<sup>18</sup>，收集有关公文；向两国政府要求：对慰安妇女性受害情况进行调查；恢复她们名誉；支付赔偿金。她们在由日本社会党议员Motooka Shoji和 Shimiz Smiko的主导的政治共同体的帮助下，收集到了有关1991年末和1992年初慰安妇的日本战争资料，尤其历史学者 Yoshimi Yoshiaki无私奉献的帮助起着重要作用(Yoshimi, 2000)<sup>19</sup>。1992年在韩国首次举行关于亚洲女性界联合会议，亚洲受害国家和日本的代表前来参加，连续至2007年举行了第8届会议。这会议被记录为，关于被日本前政府卖淫妇的女性问题由亚洲国家共同举行的首届国际会议。在初期阶段，亚洲女性界联合会议注重于：共享受害国信息；通过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使有关问题成为焦点；在处理慰安妇问题方面，谋求与日本政府有效抗衡的战略方案。

但是在讲战争中的强奸和民间轮奸公布于众时，地缘政治因素（如，强奸受害者是否白人或欧洲人）占重要比重，国际媒体也更加关注。相反，对于在亚洲、拉美或非洲发生的轮奸事件“大题小作”甚至不报道，把它视为不需关注的事(Copelon, 1995, p. 198)。因此，鉴于被日本军受害的女性主要是亚洲人，刚刚浮出水面的慰安妇问题也列为局限于亚洲的问题。从更为否定的角度来看，蹂躏女性的慰安妇问题或许已经沦为半个世纪以前的陈旧事件，而无法得到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三件事件的同一时期发生，能够以国际新闻来传达慰安妇问题，从而向日本追究战争的责任。三件国际事件界运动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塞尔维亚人(SERBS)的强奸事件；全球女性主义者人权运动；联合国制定有关妇女权利制度。1990年初期，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在南斯拉夫市民战争中的塞尔维亚人的穆斯林女性强奸事件也在相同时期发生了。这样在亚洲和欧洲战争中的各强奸事件公布于全世界，并受到关注，两个事件创出协同效应。

两件事件给全世界女性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她们积极展开保护世界各地妇女权益活动，还加快设立为保护妇女人权组织的步伐。同时，她们呼吁各国政府和连各国等国际机构设立性暴力有关机构并制定政策，以根治性暴力和犯罪(Macki, 2000)。

得益于于1980年中期就开展妇女运动的女性主义学者和NGO组织的帮助，上述的两件事情作为严重侵害女性权利的事件备受关注。考虑到过去在人权解释方面，连“主流”人权组织也把女性问题视作不是重要的事(Charlesworth, 1994)的情况，这可谓苦尽甘来。全世界战后才重视人权。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中强调建立世界新秩序所需的人权和其重要性。因此世界广泛关注人权。在这里说的人权只顾为从政治权力和武力保护大众权利，却

---

<sup>18</sup> 韩国和日本两国女性团体展开紧密合作，但对于慰安妇和战争赔偿金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参考 Chung, Chin-Sung(1997, pp. 243-244)

<sup>19</sup> 1992年1月，Yoshimi Yoshiaki在日本保安部长图书管理发现日本军有关资料，其内容为日本政府知道日本政府介入慰安所设置工作。1993年8月4日，“日本内阁委员会”上探讨“慰安妇问题”，同日，官方部长也对此陈述。(E/CN.4/1996/137, 附录 1)

不顾一般生活当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将在战争中的强奸行为等对侵害特定性的事件列为隐私领域，排在依法保护对象之外。西方女性主义者对这样的国际观点和惯例大唱反调，其中联合国扮演了主导角色。从1970年代初期，联合国让NGO组织作为观察者参加由政府代表举行的联合国论坛。因而女性NGO组织能够对各国政府如何处理妇女权利和福利问题情况监督和评估。

联合国公布，将1975年至1985年定为为妇女的10年（the Decade for Women），有关人士能够更广泛领域收集女性权益有关资料。联合国向世界公布，将于1993年在维也纳和澳洲召开世界人权会议，妇女人权学者、妇女人权保护者以及NGO组织就花了数年收集有关资料，并准备性暴力问题、女儿杀害事件、营养不均衡及性暴力等问题的报告。尤其，在由美国Rutgers University的Charlotte Bunch率领的妇女全球领导能力中心(the 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主导下，开展为维也纳人权会议的筹备活动，包括开设妇女领导能力教育项目和全球活动等多项准备。以后，女性人权运动家“掌握”1993年联合国人权会议，做出了KCW有关事实的证言。因此联合国将对妇女强奸行为定为蹂躏女性人权的暴力行为，把它纳入人权问题范畴内，乃至KCW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以联合国维也纳人权会议为契机，慰安妇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在与中国召开的第4届联合国妇女人权会议一起召开的NGO论坛上，慰安妇问题被指定为NGO论坛发现的最重要结果(Forum '95)。接着，1995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派遣出身于斯里兰卡特别调查委员会的Radhika Coomaraswamy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Coomaraswamy和Gay J. McDougall的报告书，将慰安妇问题定为1996年正式议程并开始调查。McDougall作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禁止歧视的联合国人权小委员会特别调查委员，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并撰写以对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有明确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报告书(McDougall, 1998)。为了使慰安妇问题成为国际焦点，Li,hyo-jae作为社会学女教授从KCW运动初期与Yun,jeong-ok一道，研究韩国女性界并组织韩国研究团体和韩国委员会等保护团体。韩国现代历史中，这两位女性领导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Yun,jeong-ok在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共论化方面功不可没。最终日本在国际共同体的压力下，于1995年7月设立为亚洲妇女基金，向慰安妇受害者提供资金、医疗福利等支持。但是生存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多数拒绝了这种令人羞耻的“同情之钱”。另外，国际合作获得成功，从1993年开始督促韩国政府致力于对历史事实进行收集和研究，为KCW生存者提供福利保障

## 摘要及结论

本研究由提出两个妇女问题开始，即，KCW问题是有目共睹，到底为什么长期保持沉默？那么谁、有什么变化使这一问题浮出水面？我们从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几点。第一，对于战争中强奸事件保持沉默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对她们强奸等事件无法吸引政治界的关注，只认为是倒霉的事情。而且以男性为主的政治文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发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Nazi's Holocaust)、人种清扫(Ethnic Cleansing)和南斯拉夫强奸事件的时候也把其焦点放在人种问题

上。从这种角度看，**KCW**被掩盖是情理之中。那么为什么韩国要揭开而其他受害国依然掩盖的慰安妇问题呢？对这一疑问的回答对女性和强奸问题的比较研究很有帮助。第二，由于韩国独特政治环境难以就慰安妇问题形成共识。韩国解放后，出现各种政治派别；面临着国家重建的任务。韩国战争后，转变为更加重视国家安全。这样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产业化使慰安妇问题无法受到关注。就是说，韩国社会将殖民统治时代经历的痛苦不当作社会重要课题而并不认同。

因此政府站在受害者一边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和代表她们利益，这是难以想象的。第三，韩国政治界认为**KCW**问题只不过是个人倒霉的事而已，大众也没有感到人格责任意识。在以男性为主的政治文化、入军卖淫等一样以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政治性经济活动以及性观光等产业化过程等的影响下，人们认为蹂躏女性不是敏感的问题。第四，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妇女运动界也不关注**KCW**问题。随着妇女运动界将性暴力的妇女问题视为独立的社会性问题，妇女组织改变为只关注女性问题的组织。在没有社会既得利益阶层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她们将**KCW**问题界定为特定性别的问题、特定阶层问题以及妇女人权问题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毫无力量的**KCW**受害者为揭露该事实而不得不凭借**KCW**、韩国委员会、Yun,jeong-ok教授、이효재教授，或可代表她们利益的机构和政治方法。但1980年代末和1990年初期，这种方法也难以使用。尽管如此，韩国妇女界能过拓展该活动领域归功于韩国实现民主化。

韩国民族主义到充分认识到**KCW**问题的严重性花了很长时间。当时，韩国经过殖民统治时期和二战后处于特殊阶段，所以比性问题更注重民族主义。第五，韩国女性**NGO**组织与国际展开合作，通过联合国体制督促韩日政府就此问题进行正式调查并制定福利政策。

总而言之，通过韩国政治系统民主化和女性**NGO**的努力，包括代表**KCW**受害者立场、发挥领导作用、与国际女性主义者合作等，使慰安妇这战争留下的痛苦历史问题受到社会关注。慰安妇问题并非以法律或政治观点解决的问题。目前韩日政府都似乎各持己见。历史书中很多内容还有待研究分析，活着的慰安妇受害者人数会逐年减少。虽然恢复受害者地位和得到合理赔偿还任重道远，但是韩国妇女界坚定不移地展开为解决慰安妇问题的活动，为韩国现代历史开创了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Baumel, Judith Tydor. (1998). *Double Jeopardy – Gender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 Portland, OR: Vallentine Mitchell & Co. Ltd.
- Brownmiller, Susan. (1975). *Against Our Will*. New York: Bantam Books
- Chang, Iris. (1997). *The Rape of Nanki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Charlesworth, Hilary. (1994). What are 'Wome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In Rebecca J. Cook (Ed.), *Human Rights of Wom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hung, Chin-Sung (1997, Spr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Problem in Imperial Japa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5 (1), 220-222 & 243-244.
- Chung, Sei-wha (Ed.). (1986). *Challenges for Women: Women's Studies in Korea*. Seoul: 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
- Colar, Gerry Rodgers. (1992). *The Vienna Tribunal* [Documentary video tape]. New York. Women Make Movies.
- Coomaraswamy, Radhika. (1996, January 4). E/CN.4/1996/53/Add. 1. New York: U.N.
- Copelon, Rhonda. (1995). Gendered War Crimes: Reconceptualizing Rape in Time of War in Peters. In J.S. Peters & Anderea Wolper (Eds.),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 21, pp. 197-214).
- Dolbeare, K. M. (1974).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 C.P. Cot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5.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Bobbs-Merrill.
- Forum '95: The Independent Daily of the NGO Forum on Women, Beijing '95. (1995, September 3 headline section & September 8, 1995 Editorial section).
- Friedman, Elisabeth. (1995), "Women's Human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a Movement," in Peters, Jule & Wolper, Andrea, eds.,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p. 18-35.
- The Hankuk Ilbo*. (1994, December 22; 1992, February 28).
- Hicks, G. (1994). *The Comfort Wome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Hosoya, C., N. Ando, Y. Onuma & R. Minear (Eds.). (1986).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okyo: Kodansha Ltd.
- Inenaga, Saburo. (1978). *The Pacific War 1931-194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Inter-Ministerial Working Group on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Republic of Korea. (1992, July) *Military Comfort Wome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terim Report). Seoul.
- The Japanese Cabinet Councilors' Office on External Affairs. (1992, July 6). On the Issue of Wartime 'Comfort Women' (E/CN.4/1996/137, annex 1)
- Kawada, Humiko. (1992). *Red Roof Tiled House: A Story of a Military Comfort Woman from Chosun* (Hahn Woo-Jung, Trans.). Seoul: The Mae Il Economic Daily Newspaper.
- Kim, Sam-Woong, Lee Hon-Chong & Chung Woon-Hyun (Eds.). (1993).

- Chin-il Pa* [亲日派, Pro-Japan Group]. Seoul: Hak-Min Sa.
- Kim, Yung-Chung. (1976). *Women of Korea: A Hi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to 1945*. Seoul: Ewha Womans Univ. Press.
- The Korea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998). *Research on Industrial Type Prostitution* ['98 Research Report] (pp. 240-17). Seoul: KWDI.
- The Korean Church Women United. (1988, April). *Women and Tourism*.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eminar held on 20-23 April, 1988 in Seoul & Cheju Island. Seoul: Korea Church Women United.
- The Korean Council for the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2000). *Report on 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on Japan's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Seoul: KCWDMSSJ.
- The Korean Council for the Women Drafted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2005). *History That Can't Be Erased—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Seoul: KCWDMSSJ.
- Lee, Chang-Hee. (2006). Re-Examination of the ROK-Japan Treaty. In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Proceedings—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kshop on Korea-Japan History Related International Law* held on December 5, 2006, p. 295.
- Lee, Hyo-Jae. (1989). *Korean Women's Movement: Past & Present*. Seoul: Chung-Woo Sa.
- Lee, Hyun-Sook. (1992). *The 25 Years History of the Korean Church Women United* (Korean). Seoul: The Korean Church Women United.
- Macki, Vera. (2000). Sexual Violence, silence, and human rights discourse: The emergency of the military prostitution issue. In Anne-Marie Hilsdon, Martha Machintyre, Vera Machi, & Marla Stivens (Eds.),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Politics: Asia-Pacific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cDougall, Gay. (1998, June 22). UN DOC.E/CN.4/Sub.2/1998/13. New York: U.N.
-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Korea. (1992, 7). *Fact-Finding of th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Mid-term Report). Seoul.
- The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2006). *Proceedings—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kshop on Korea-Japan History Related International Laws* held December 5, 2006. Seoul, Korea.
- Novick, Peter. (1999).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 Ofer, Dalia & Lenore J. Weitzman. (1988). *Women in the Holocaus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Republic of Korea. (2006, August 26). *The Press Release about the post-declassification of the ROK-Japan Basic Treaty*. Seoul.
- Pai, Ei Whan. (1991). *Borit gogae-nun numeotjiman* [青黄不接过去了, Although We Crossed Over the Spring Hunger: Memoire]. Seoul: The Korea Herald & the Naewoi Kyungje Shinmun.
- Pang, Sun-Joo . (1992). Review of the Korean "Military Comfort Women" Appeared in the U. S. Document (Korean). *Guksagwan Nonchong* 37

- [国史馆论总 37, Review of National History 37], 218-219.
- Park, Won-Soon. (1994, Fall).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Humiliation and Forgotten History. *Yuksa Bipyung* 26 [历史批评 26, The Critics of History 26], 233-256.
- Rosenbaum, Alan S. with a Foreword by Israel W. Charny. (1996). *Is the Holocaust Uniqu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BS. (2006, November 19). Military Base Women [Television program episode]. In the program *Geugeot-i algosipda* [想要该事实的真相, Want to Know That]. Seoul: SBS
- Schubert, Glendon. (1992, March 6).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Use, by the Japanese Army, of Females as Sexual Slave [Mime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 Sekiguchi, Noriko. (1990). *The Senso Daughters* [Documentary film]. Australia: Tenchijin Productions & Sigle Co., Ltd.
- Stern, Kenneth S. (1993). *Holocaust Denial*. New York: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 Ueno, Chizuko & Beverley Yamamoto. (2004). *Nationalism & Gender*. Melbourne: Trans Pacific Press.
- 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Team Attached to U.S. Army Forces India-Burma Theater APO 689 reports (Report No. 49, 1944, October 1) of an interrogation result of the "20 Korean Comfort Girls: who were "captured on August 10, 1944" as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 Yoon, Bang-Soon. (1996, Summe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Political Agenda for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God's Image* 15 (2), 86-94
- Yoon, Bang-Soon. (2001a). Politics of Agenda-Building in South Korea. In Stuart S. Nagel & Amy Robb (Eds.), *Handbook of Global Social Policy* (Chapter 12).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 Yoon, Bang-Soon L. (2001b). Democratization and Gender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In Rita Mae Kelly, Jane H. Bayes, Mary Hawkesworth, and Brigitte Young (Eds.),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hapter 10). Lanham: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Yoon, Bang-Soon L. (2007). *State, Sexual Violence, and Women's Civil Society Movement for Policy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gress for Korean Studies 2007, the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3-25, 2007, Pusan, ROK
- Yoshimi, Yoshiaki. (2000). *Comfort Women*. (Suzanne O'Brien,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